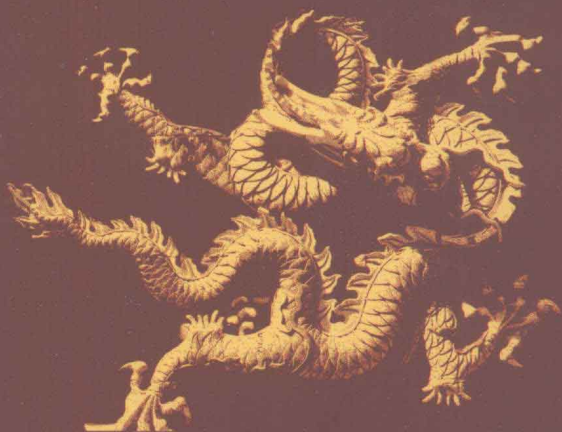




中国古都学理论建设刍议
论周秦汉唐文化对我国古代都城规制之影响
中国古都研究与古都之现代化建设
古都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
发掘古都文化遗产 发展古都旅游事业
论中国古都之大遗址保护

中国古都学的 研究历程

朱士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古都学的 研究历程

朱士光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朱士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5004-6769-4

I. 中… II. 朱… III. 都城—中国—古代—文集
IV. K92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9171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曲 宁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7.375

插 页 2

字 数 419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陈其泰教授序

都城对于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都城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在每一时代，均为全国士庶之所仰望，民心之所牵系，它又是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因此都城的确定、建设与其指挥号令的通畅无阻，往往直接关系到一代之盛衰兴亡。

中国古都中建都时间最长，地位最重要者，首推长安（包括周京丰、镐和秦都咸阳）和北京。在一定意义上说，几千年中国历史的许多关键事件、重大场面，其上半部和下半部，就是分别与长安和北京这两处古都直接联系的。长安在古代作为都城实在渊源久远，肇起于宗周。周人本起于岐山之下，传至文王乃迁都于丰；武王继起，又迁于镐。丰、镐在沔河两岸，实为一城，距今日西安市不远。这里原野开阔，物产丰饶，交通方便。周人在此建都，实为其向东发展、经营中原广大地区占据着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地。故《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这一诗篇，以庄严的笔调歌颂文王、武王迁都丰、镐，对周王朝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镐京辟雍，自西而东，自南而北，无思不服。”关中地理形势极其险要的特点，用汉初人的话来形容是：“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史记·高祖本纪》）周人东迁洛邑，

秦人继起。秦的先人最初创业于今甘肃东南部，以后逐渐沿渭水东进，至秦献公时，为了便于与魏国争夺河西土地而迁都栎阳，自此秦国日益强盛。但栎阳只是临时都城，至秦孝公时，采纳商鞅建议，迁都至咸阳。这里更占据形胜之地，扼水陆交通之枢，为秦的日益强盛提供十分优越的地理条件，以后终于兼并六国，统一华夏。

西汉建国，汉高祖刘邦初都洛阳，不久即定都长安。在定都问题上，当时有两种主张。群臣原籍在山东（崤山以东地区），希望都城邻近家乡。他们认为：秦都关中二世而亡，周都洛阳则延续了几百年。洛阳东西有成皋、崤山之险，南北靠着黄河、洛河，可以据险而守。另一种看法是：天下尚未太平，关中三面有险可以固守，一旦有急难，可以动员百万之众东制诸侯。经济上，关中腹地广阔、物产丰富，“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因此，建都关中就等于“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和《留侯世家》）提出后一种主张的是娄敬和张良。娄敬当时是挽车的戍卒，从齐到关东（函谷关以东地区）服徭役，穿着粗布短衣求见，向刘邦提出这一建议。刘邦认为娄敬、张良的主张有远见，予以采纳，随即定都长安。多年来刘邦委任萧何在关中镇守，汉在关中地区统治稳固。不久后，异姓王臧荼、陈豨、英布等叛乱，景帝时同姓王吴楚七国之乱，都是在山东地区发生；汉都长安处在西方，凭借其险要形势控制全国，有利于保持大局稳定。由于建都问题在西汉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白寿彝先生主编之《中国通史·秦汉卷》，在“西汉皇朝的建立和巩固”一章中，专设了“定都长安”一个题目予以论述。

金代建都北京，是中国古都史上又一大事，它既是历史发展

的继续，又是女真族建立的金代政权见识宏远的选择。北京与长安同样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古都，古时称蓟，春秋战国时为燕国都；辽时建为陪都，称燕京；金时正式建都，称中都。金人曾这样描述其形势特点：“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金史·梁襄传》）蒙古占领后，复称燕京，成为蒙古国汉地统治机构的首府。这里北枕长城和燕山山脉，南面俯临广袤的华北平原，有畅达的水、陆通路连接江南、华南、西北、西南地区，向东经山海关可控制东北。在全国统一规模更加发展之后，北京地处北部游牧地区和南部农业地区交界处这一战略位置，便成为辖制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总枢纽之天然大都会。当时的蒙古族政治家也有见于此，他们意识到随着蒙古国从一个草原游牧的国家发展成为统有中原的“大朝”，政治重心势必转移到这一既开阔畅达、民富物阜，又形势险要之地。便于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营造燕京宫室，指定了中央政府——中书省衙署，至元元年（1264年）下诏正式称为“中都”。至元四年，开始都城的大规模的建设，以太保刘秉忠负责建都总设计。秉忠因燕京内城破坏较甚，遂选定旧城东北旷地为都城新址，按中国传统的都城宫阙制度作了全面规划，城垣、宗庙、衙署、坊市相继兴建，历时十年全城竣工，气势宏伟，规模整齐，定为首都，称为“大都”。以后历明至清，一直以北京为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仍然定都于此。

古都不仅是号令四方、统率全国臣民的政治中心，又是集中各方面优秀人才从事学术、文艺、科技、建筑各项创造的文化中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水平和时代的精神风貌。唐朝首都长安，集中了各个文化学术部门的出色人才，充分展现出唐代文化的辉煌灿烂、丰富多彩，及其融汇境内各民族文化并广泛与外国交流的宏大气魄。隋朝定都长安，开皇间开始兴建，唐朝又

屡加修筑，全城南北长八千四百余米，东西长九千五百余米，成为一座规模宏伟、景物壮观的大都会。长安城自北至南为宫城、皇城、南市（以纵贯南北的朱雀门大街分为东西两半，称东市和西市），皇族、官员、平民百姓的活动和居住各有区域，全城的居住区共建一百零九坊，街道宽阔，绿树成荫。宋敏求《长安志》描述说：“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这样精心规划、整齐宏伟的大都城，不仅为历朝所空前未有，在当时世界上也令外国人士叹为观止。故日本人模拟长安的建制，先后兴建平城京和平安京。就在这样一座气魄非凡的大都会，上演了华夏各民族共同创造瑰丽文化和各国间广泛交流的动人活剧。范文澜先生著《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设有专节“唐代长安——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作了引人入胜的论述。长安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唐太宗即位后即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如《旧唐书》所说，“是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弘文殿中聚集群书，多至二十余万卷，是全国藏书最富的中心图书馆。贞观以后历朝，在唐朝廷供职或不供职的文儒，多在长安来往或居住。“由于朝廷的提倡，每逢节日，朝士词人，游宴吟咏，佳句美篇，不久即传入宫禁，流布远近。长安有左右两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外域传来新声曲，一经教坊摹演，全城艺人，竞相仿效。音乐在唐代相当发达，而长安又是发达的顶点。唐代重要仕途之一是以经学为手段的明经科。唐太宗诏颜师古定五经，孔颖达撰正义，长安成为经学的中心。史学也是一门有成就的学问，自长安开史馆后，开官修前代史的新风。每有外国使者来到，鸿胪询问土地风俗，道里远近，报送史馆。长安又是全国教育中心，国子监总设七学馆（国学、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各置博士。国子监经唐太宗倡导，添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收中外生员多至八千余人。外国贵族子弟来中

国，多人国学留学。‘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日本正式派出的遣唐使前后共十三次，唐中宗至唐玄宗时四次遣唐，规模尤为盛大。遣唐使归国后，多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唐代的文化制度随之介绍到日本。每次随遣唐使来中国的留学生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都在长安国学肄业。在长安的日本留学生，至少留住数年，多者到二十余年、三十余年。他们的生活渐染唐风，回国后也就转播于日本。新罗也多派留学生来唐，据《旧唐书》记载，开成五年（840年）一次归国的新罗留学生，即有一百零五人之多。“对唐人说来，外域传来的文化，都是开发耳目的新事物。对到达长安的各国人说来，唐文化也是启迪心智的新见闻。长安是国内国外各色人聚居的城市，汉族居民而外，当时自立邦国的少数民族，如南诏、吐蕃、回纥、龟兹、于阗、疏勒等等，也多有官方人员或才士艺人长期留住，甚至世代安居。以长安为中心，中国各民族之间，中国与当时世界各国之间演出了交流文化的大场面。”“长安正就是这样各个民族相互影响，各种文化相互流通的中心点。”（参阅《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二册“唐代长安——各国文化交流的中心”一节）

以上仅是就一时想到的长安、北京这两处最重要的古都作为古代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明显的几点略谈感想，更何况还有洛阳、南京、开封、杭州、安阳等著名古都，还有自夏朝以来四千余年间经过众多民族艰苦缔造的一大批年代较短或者属于地方性政权的都城（据学者研究共多达二百处以上），以此更可说明古都研究所应具有丰富内容和深度。古人也早就认识到都城对于历史文化的重要作用，自两晋南北朝以后历代已出现一批有名的专门著述，如《洛阳记》（晋陆机）、《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衒之）、《两京新记》（唐韦述）、《东京梦华录》（宋孟元老）、《帝京景物略》（明刘侗）、《历代宅京记》（清顾炎武）等。在我国

丰厚的古都文化积淀和前人著述的基础上，近二十年随着学术的新进展，经过历史地理学界的学者卓有成效的努力，一门新的学科——古都学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这对于总结历史遗产、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发展民族新文化，无疑是意义重大的事情，我们举起双手热烈欢迎，并期望从事古都学研究的专家们继续贡献出更多的新成果！

朱士光教授为中国古都学会现任会长，二十几年来在古都学这一新的学术领域中辛勤耕耘，多所著述，现在《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一书将其不断探索获得的成果结集出版，实在可喜可贺！我有幸得以先期阅读书中部分篇章的校样和全书目录，深被著者的开阔视野、渊博学识和精彩论述所吸引。如古都与中华文化研究之关系，是著者多年来探索最深入的问题之一。文中从方法论角度，总结近代以来古都研究的三个层次：微观复原性研究，如有关古都建筑设施之大局和细部，以至事件和人物的研究；宏观综合性研究，如侯仁之著《历史上的北京城》和由他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朱士光主编《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在前述两项基础之上，再深入探析古都文化的研究，近年来已日益成为古都学领域一个主导方面，正蓬勃深入进展。著者进而提出关于古都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观点和设想，包括：“古都文化是历史上一个王朝或一个时代文化之缩影”；“古都文化是历史上以至当今特定区域文化的中心”；“古都文化空间辐射力、时间穿透力强劲。在当时就在自己统治区域内或藉重朝廷官府力量，或凭借自身之品位魅力广泛传播，有的甚至远传域外”。在王朝或政权更替之后，其精粹部分融入新王朝或新时代文化之中，并继续发挥其影响作用。他又特别强调：“古都文化浓缩了中华文化之精髓，深入至中华文化之核心，也渗透到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通过研究古都

文化，可以集中而又深入地认识与把握历史上一个王朝或一个政权的文化以及由它们统治过的一个区域的文化之内容及其特质，同时还可以通过研究古都文化推进对中华文化多个层次多个侧面的深入研究。”这些切中肯綮之论，实在极具启迪意义。他如书中《论中国古都与中华文化研究之关系》、《中国古都学理论建设刍议》、《中国古都学的形成与当前研究的几个重点问题》、《初论我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的演变及其与儒学之关系》、《论中国古代都城规制之特点及其与保护古都风貌之关系》、《试论当前我国古都保护与城市建设问题》、《中国古都研究与古都之现代化建设》、《古都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探析环境变化、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之关系，推动古都名城研究的深入发展》、《论中国古都之大遗址保护》等文，对古都学的发展概况、学科特点、学术价值、当前社会应用的意义和学科研究前景的展望，以及一些专门性研究领域，均提出了具有重要创新价值的观点，作出了深刻的分析。这一很具学术创新价值和开拓意义的研究成果，无疑将对古都学学科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广大的读者则定能从中获得有关历代都城及相关历史文化的宝贵知识，开阔视野，提高文化情趣，增强对伟大祖国的热爱。

我和士光教授是交往时间近半个世纪的老朋友。我们同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考入中山大学，虽然所在并不同系，但却志趣相投，友谊深厚。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两件小事：士光虽是地理系学生，却热爱历史学，曾工整地抄写了《史记》全书的目录，并赠送给我；我是历史系学生，但对历史地理甚有兴趣，曾购买当时刚刚出版的由侯仁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我虽宝爱此书，但想到对于士光来说更加有用，便送给了他。自1963年毕业后，虽然各处一方，并且各自都经历了曲折坎坷，但我们都始终深切地关注对方的工作，并在精神上给予

力所能及的支持。20 世纪 90 年代初，有一家出版社曾计划出版一套《华夏文化丛书》，让我一起拟定选题。我当即想到了士光兄，去信建议他写一本《古都纵横》，果然得到他慨然应允，大力支持，很快就拟成内容丰富、极具特色的撰写提纲寄来。虽然《丛书》的计划最后未能实现，但就因为这件事，却使我与士光兄的古都学研究和这部大著的关系密切起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早已将本书列入出版计划，士光教授命我作序，推辞不过，因就拜读书稿而引发的一点感想写在上面，以此表达对士光教授所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的衷心祝贺！并表达对古都学学科壮大繁荣的发展前景的衷心祝愿！

2004 年 4 月初稿

2007 年 8 月修改于北京

李健超教授序

《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论文集）是中国古都学会现任会长朱士光教授二十年来发表的有关中国古都学术论文和在有关会议上讲话的汇集，所选篇目基本上代表了本学科的最高水平，为学术理论界提供了在世纪之交中国古都学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是一部写实而富有学术价值的专题论文集。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据突出地位并具有重大影响的知名古都，这些古都和数以百计的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浓缩与结晶，是我国和整个人类的宝贵历史遗产。所以，研究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科学意义上的古都学发轫于 20 世纪中期，到世纪之交，历史给中国古都学的发展和形成带来了契机。在迈向 21 世纪之际，新中国经过 50 年艰苦曲折的斗争，城市现代化建设步入到快速发展阶段，对原有旧城区进行更新改造和外延扩展，如何充分发挥古都的独特优势，处理好古都现代化与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促进古都的持续发展，是当代人无法回避与必须正视的重大历史课题。于是，历史地理学界、考古学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学界，涌现出一批研究古都学人才，并取得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古都学研究成果。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抓住机遇倡导并于 1983 年 9 月在古都

西安正式成立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古都学的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关于中国古都学的意义、学科范围以及研究方法等，中国古都学会的创建者史念海教授已有精辟的论述。朱士光教授的《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继往开来，和而不同。在方法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视角，在中国古都与中国文化研究之关系、保护古都文化遗产与古都风貌、古都的现代化建设、古都旅游资源开发等诸多层面上都有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其理论价值与创新之处体现在：

一 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都规划模式之关系有深入阐述

中国古代都城众多，特点各异，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都城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文化。朱士光教授从历史文化角度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城址选择、都城的规划分布与传统模式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对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模式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尤为精辟。他总结了中国古都受自然地理环境与民族文化影响的五个基本特点：（1）回字型重重相套的城垣；（2）南北向的城市中轴线；（3）宏伟的皇宫殿宇与完备的礼制建筑；（4）规划整齐的街陌里坊；（5）富于东方文化情趣的苑囿园林。并指明这些都是中国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关于都城建设规制模式的具体体现。

二 对中国古都与中华文化研究之关系有精深的见解

一个民族存在的根基是文化。历史文化的厚重源于它承载着特定的时代信息。作为古代城市的最高形式和全国首善之地或地域中心城市，都城往往是当时王朝或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其存在至今的文物古迹、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的传统风

貌，都是记录历史脉动的载体。这些博大精深的遗存、遗风、遗俗构成了古都的特质风貌与个性，凝聚了我国传统文化及历史文明的精华，反映了一个国家绚丽多彩的历史精髓。朱士光教授在《论中国古都与中华文化研究之关系》一文中，从深层次上总结出古都文化的四大特征：（1）古都文化是历史上一个王朝或一个时代文化的缩影。（2）古都文化是历史上以至当今特定区域的文化中心。（3）古都文化内涵丰富，品位最高。举凡历史上物质文化方面的城垣、宫殿、宅第、园囿、道路与陶瓷、木石、金属器皿以及服饰、食物、舟车等用品，精神文化方面的典章制度、思想观念、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风习俗等均包容在内。（4）古都文化空间辐射力、时间穿透力强。首都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藉其政治优势或凭据自身品位之魅力广为传布，甚至远及域外；尽管朝代更替，古都积淀的历史文化还能继续发挥其影响力。因此，可以说古都文化浓缩了中华文化之精髓，研究中华文化离不开古都文化；通过研究古都文化可以更加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

三 研究古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将意蕴深厚的古都文物与风貌绵延不绝地传承下去，不至于在现代化的匆匆步履之中消失

朱士光教授痛心指出：“我们的一些地方领导部门和政府官员以及一些房地产业、旅游产业的开发商与基建施工单位的负责人，或者是出于无知，或者是为眼前的局部利益所驱使，对之都采取了极为轻率的态度……对古都与古城之遗迹遗物造成了令人痛心的破坏。”他举北京和西安为例，北京的城墙与多座城门、城楼，自50年代以来即遭到彻底拆毁，至今仍使国人痛心疾首，扼腕浩叹！西安的汉长安城遗址等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这些记录历史脉动的载体，本是祖先运用他们的智慧与血汗

给我们艰辛建造出来，而后又经过漫长的风雨沧桑，作为劫后余殊幸存下来，这批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都形象直观地储存着特定的时代信息，实际上就是一段凝固的历史；而且它对于历史文脉的延续最具有影响力。作为历史遗存（留）的有形遗产（如文物古迹），它具有不可再生性，一旦毁坏将无法挽回，哪怕是一砖一木，一旦被毁，我们的民族文化就少掉了某些遗传因子，这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如果北京失去四合院，绍兴找不到乌篷船，苏州看不到小桥流水人家，洛阳不见了古都遗迹……那么，祖国五千年的历史到哪里去找呢？

他在一些论文中强调研究古都，保护古都风貌是为当前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为此，首先当提高对我国古都文物与古都风貌在我们民族历史文化中的地位的认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是这个民族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史中能够迭经沧桑巨变而绵延发展，历久不衰，即全赖传统文化的有力支持。可见历史文化实为一个民族的灵魂与生命源泉。作为古代城市的最高形式和全国首善之地的古都，是当时王朝或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文物古迹荟萃，因此保护古都文物与古都风貌，对继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凝聚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研究古都要为我国古都的正常发展提供历史根据。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的城市建设如狂飙突出，时下仍然方兴未艾。但人们不禁在为越来越多的大厦、越来越气魄的高楼欣喜之余，却发现这些由现代化建筑组建的城镇几乎是“万城一面”，原有的优美和独具特色的建筑淹没在拔地而起的现代建筑的汪洋大海之中，既缺乏民族特色，也失却了地域特征。而古都学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古都的历史风貌、文化底蕴，为古都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还一些论文中论及研究古都还可为旅游事业服务。中国

的古都以它丰富的历史内涵、典雅庄重的东方古建筑群及雄伟秀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万千中外游人，成为举世瞩目的旅游热点。古都西安正是以她独特的黄土高原风景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成为世界旅游胜地：历代城址、城垣、宫殿遗迹、近百座帝王陵墓与数十座建筑雄伟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寺观以及百万件珍贵的历史文物，特别是 84.1 平方公里的隋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城市，代表着中世纪人类的最高文明：轰动世界的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以及其他珍贵历史文物的出土，使西安被誉为“天然的历史博物馆”，受到国内外游人的青睐。更是飘零海外的游子从那布满历史陈迹的秦砖汉瓦追溯到先祖列宗的根，从唐墓出土的“唐三彩”骆驼俑仿佛聆听到“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

当然，《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也有缺点和不足之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古都吸取域外文化，使古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方面，就未有专文论述，显得缺失。另一方面，中国古都文化对国内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周边国家高丽、新罗、日本的影响也未见阐述。高丽、新罗、日本在中世纪的都城模式均仿照中国的长安和洛阳，甚至于连一些城门、街道和坊市的名称也照搬长安或洛阳，至于这些国家的典章制度、衣冠文字、文学艺术、宗教等都以古都长安和洛阳为其源头，因而是应该予以注意的。

总之，作者以高屋建瓴之势，谈古论今，使《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一书内容充实，论证充分，见解独到，思路清晰，逻辑性强。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力求文字简练，生动有趣，使读者兴味盎然。因而深信出版后，能使读者获益，并推动中国古都学的进一步发展。

2003 年 8 月 28 日初稿

2007 年 9 月 22 日改定

目 录

陈其泰教授序	(1)
李健超教授序	(9)
论中国古都与中华文化研究之关系	(1)
中国古都学理论建设刍议	(18)
中国古都学的形成与当前研究的几个重点问题	(24)
论周秦汉唐文化对我国古代都城规制之影响	(45)
初论我国古代都城礼制建筑的演变及其与儒学之关系	(49)
论中国古代都城规制之特点及其与保护古都风貌 之关系	(57)
试论当前我国古都保护与城市建设问题	(73)
中国古都研究与古都之现代化建设	(82)
古都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	(102)
中国七大古都始都年代考	(111)
试论我国历史上陪都制的形成与作用	(123)
论历史地理学对推进我国古代都城与城市研究的 意义和作用	(142)
探析环境变迁、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之关系，推动古都 名城研究的深入发展	(151)